

在先秦典籍中,受责难最多的,恐怕要数《国语》了。唐代柳宗元写《非国语》,一写就是六十七篇,清人崔述在他的《洙泗考信录余录》里,给《国语》下了个“荒唐诬妄,自相矛盾”“文词支蔓,冗弱无骨”的考语,更是从史和文两个方面,把《国语》一笔抹倒。综观古今学者的种种责难,有许多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确实看到了《国语》的缺陷;而有的则失之偏颇,失之公允。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国语》呢?这还得从它的材料来源和成书过程说起。

原来,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一是太史,执简册以记事;一是瞽矇,凭口传以记言。徐中舒先生认为,这是原始社会刻契和传说的发展,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历史。《国语·楚语》所说“史不失书,瞽不失诵”,就是说的这种制度。太史所书叫做“春秋”,瞽矇所诵叫做“语”。“春秋”“语”都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到了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公室衰微,史官流散,私学兴起,文字史记和口头史记同时外传,并师承授受,开始是记录下来,然后再经整理编排,加工润色,写定成书,源于太史简册而成书的是《左传》,源于瞽矇口诵而成书的便是《国语》,而太史记事,瞽矇记言,这正是《左传》事多于言,《国语》言多于事的原因。

《国语》的具体成书年代已不能确考,说《国语》是汇编之书,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但最后经人编排整理而成书,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国语》一书的得失,正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史料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国语》的得失。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此书取材零散,遗缺错谬颇多。春秋封国林立,而书中只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又多寡详略悬殊。远不如《左传》完整、系统、可靠。这正和《国语》源于瞽史有关,一般说来,口头传说是不如文字记载可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语》毫无史料价值。白寿彝先生曾作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统计,《国语》共有196个条目,与《左传》所载主题相同的有104条,这些内容,《左传》有,《国语》也有,怎能说《左传》所载是信史,《国语》所载就成了诬妄之言了呢?而且,相同之中又有不同,那就是一个偏重记事,一个偏重记言,言事相参,不是正可互证、互补么?

另有94条是《左传》所无的。《左传》所无,也不一定就是诬妄,其中大多还是信史,正好补《左传》之缺。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从记事年代看,《左传》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1年),而《国语》始于西周穆王(约公元前967年),早出246年,这二百多年的历史,

【读典】

《国语》漫谈

《左传》并非完全不曾涉及,但《国语》所载的一些史实就比《左传》多而详,所以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是常常征引《国语》的。第二,《左传》虽长于记事,特别长于记叙战争,但“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而《左传》反映“祀”的内容就不多,《国语》却有不少有关祭祀的记载,虽然由此引起柳宗元等人对它的天命鬼神之类迷信思想的批判,但从保留史料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有价值的,因为祭祀在当时既是国之大事,要想研究那个时代的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有关祭祀的材料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第三,《左传》对非华夏地区的历史记载很少,连春秋末年称霸一时的吴、越两国的史事也多付阙如,《国语》中的《吴语》《越语》却有比较丰富的材料。其他有关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一些材料,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有这些,正可补充《左传》的缺失。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写《史记》便参考了《国语》。把《史记》与《国语》对照一下便不难发现,《十二诸侯年表》和某些《世家》里的许多史料;都是采自《国语》的。看来,《国语》并非满纸荒唐言。还是高塘在《国语钞序》中的评价比较公允,他说:“左氏所有者,可互相发明;所无者,可补所未备。实足以翼传而行。”古人把《左传》称作《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我们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看《国语》的得失。同古代许多史籍相似,《国语》也反映了天命论、英雄史观的落后思想,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失掉民心会丧失政权(这在厉王止谤,宣王料民等篇章中有所反映),但并没有跳出天命论的圈子。由于它对人民的伟大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它很少记录人民的言行,如果说它偏于记言,也多是“君臣之言”。

曾有人批评《国语》的内容杂乱,毫无章法,其实,它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这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书所载内容,都围绕一个主题:兴和衰,而且作者通过对史实的记录编纂,能有意识地去探讨兴衰治乱的原因。如它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作者认为,穆王伐犬戎的恶果是“自是荒服者不至”;而西周“及幽王乃废灭”的重要原因是宣王料民失去了人心。所记其他各国霸业的兴衰,国政的成败,也无不着眼于探索兴衰治乱的原

【读读写写】

文章之道与现实关照——读葛晓音《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范》

“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清·刘开云《与阮台台官保论文书》)。无论是明道、论政还是艺术风格,“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无不代表着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是以昭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在《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的典范》中,葛晓音不但对唐宋文风改革的精神追求做了深入观察,还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大家对儒家传统政治观和文学观进行了全面的清理,特别是从儒道内涵的演变出发提出来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又各具鲜明的艺术风格。“文以载道”,既喻指着“文章合为时而著,不为文而作”的精神,又突出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在《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的典范》中,葛晓音浓墨重彩地阐述了“古文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的社会历史价值。她认为,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皆是“古文运动”倡导者、践行者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们

或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但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倡导“有用之言”,强调行文“必须适用于当时时务”;二是“文以贯道”,“道”即“圣人之道”、“尧舜之道”,这是文章之本,文章的思想内涵之核心所在。

“古文运动”不仅是文体的革命,更是文章内容的变革,“阐明儒家古道的宗旨,摆脱骈俪体的束缚,使文章的形式为内容服务。”韩愈认为古文的内在精神是由作者的人格精神、内在品性所决定的,也就是文格与人格要达到高度的统一。用“经世致用”之文章关心时政,文以明道达到教化、爱民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出自己人生价值的崇高志向。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政论、史论和文论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政治改革紧密配合,其中既包括了对北宋土地兼并、官吏冗滥、上层社会奢靡、徭役赋税沉重等重大社会积弊的具体分析,又对财务、边防、任贤等政治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文参政,以政入文。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被誉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唐宋散文最突出的特征是关照社会现实,“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原毁》《朋党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针对中唐士大夫相互攻伐、道德不修的积俗,韩愈在《原毁》中以“古之君子”

岁月如书,一年一卷,供世人阅读。一年四季,分成四辑,而秋之篇章,插图甚多。

秋天的插图,是村前那棵古老的刺槐树。虽然它不再有春天金色的槐花,而且黄叶满枝,徐徐飘零,最后只剩下虬枝,像书画家遒劲的枯笔。而落叶厚积,铺满了那条通往菜园的小路。乡亲们来来往往的脚步印在上面,似乎较往昔多了一份喜悦。只是,一个耄耋老人走到树下,驻足远眺,却给我的视野带来一份震撼:大地如树,众生如叶,终有飘零之日。

秋天的插图,是离刺槐树不远的那条小溪。经过了春天的蓬勃,经过了夏天的奔放,进入秋天,溪水变得格外宁静,仿佛一面镜子,搁在古村的妆台。有鱼,从水底岩石下娓娓而出;旋即,又娓娓而隐,仿佛是一场时装走秀。让溪水静中有动,带给人们一种禅意。

秋天的插图,是小溪对岸那一片葱绿的菜园。爷爷奶奶和一些乡亲在菜园里锄草施肥,白菜、生菜、花菜、莴笋,像一朵朵花卉,绽放着自己的青春;韭菜、葱子,像一个个排列整齐的仪仗队,在接受蔬菜的检阅;静心选留经过暴晒的红辣椒和西红柿,像一个个灯笼,传递着菜园的喜庆。

秋天的插图,是一场突然而至的秋雨。斜斜密密,飘飘洒洒,仿佛织女手中的纱线,丝丝缕缕,牵系着哀愁。飘落在叶,有细微声响;飘落在身,更有淡淡寒意。隔窗听雨,感觉诗意从线装的唐诗宋词中纷纷跌落,带着我走进古典的诗情画意,如歌往事,历历在目。秋雨之夜,掌一盏红灯,泡一杯花茶,摊开书卷,开始跟古人幽会,顿觉荡胸生层云,景象万千。

秋天的插图,是故乡那谢了春红的远山。曾经与小伙伴放牧过耕牛的群山,像演出完毕的明星卸了盛装。山坡,如同高中时期报考体育专业男同学紧绷的肌肉,山脊像他暴凸的青筋和结实的骨骼,处处彰显出阳刚之美。在秋风秋雨中,秋山愈加显现原始野性和澎湃激情,让目睹生命的本真。

秋天的插图,是爷爷奶奶晚上从家乡打来的电话,是爸爸妈妈拨通的微信视频,是堂兄从广州寄来的月饼。亲情,筑起坚实的围墙,让即将到来的冬季不再寒冷!

和“今之君子”在责己和待人上的不同态度作为对比。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唐宋八大家”在文坛政坛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可。他们中的欧阳修不但散文风格“具有古风的质朴流畅,而且毫无迂腐做作之气”,“欧阳修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我毫不犹豫地将其置于班固之上”(徐仲年《中国古今文选》)。欧阳修尤擅把政治主张融于文学之中,他的《朋党论》即针对传统“君子朋而不党”反复论证,从根本上揭示了“朋党”的实质。他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关键在于“辩其君子、小人而已”。“心有信仰,胸怀天下。”不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守护着读书人高洁的人文情操,并张扬着传统古典文学的清风俊骨。

“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为难,其得称为大家,抑尤难也。是故巧言丽辞以为工者,非大家也;钩章棘句以为奥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骈四俪六以为华者,非大家也;繁称远引,搜奇抉怪以为博者,非大家也。”正如清代著名理学家张伯行先生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序》中所言,大家之文,其气昌明而伟俊,其意精深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穷,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透过《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范》,无论是信手一章还是随手一页,我们皆可由此对唐宋古典散文通观衢路,即“无论是对八家成就的条析论列,还是对具体篇目的编选解说,(葛晓音)都深具会心”(刘宁《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读葛晓音《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范》)。

刘英团

【悦读书架】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就要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

90多年来,每一次党代会都要对党章进行修改。党章的所有内容和条文,都经历了一个发展沿革的过程。所以,党章既是党的总规矩,也是党的历史的缩影。党章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条文的背后,都有很多真实和生动的故事。了解党章沿革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党章的内容和条文,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作者别出心裁截取了1949年1月至10月这段时间,集中国绕新中国筹建这一主线展开叙述,清晰地描绘了新中国从萌芽、发育,到成型、诞生的过程。这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共和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本书角度新颖,史料丰富,写的是故事,反映的却是规律,是经典的“国史教育第一课”。

(董伟/著 东方出版社)



江苏最美书店——永丰诗社。 文广/摄

“狮”从何来

狮子起源于12.4万年前的非洲,大约2.1万年前走出非洲,最远到达欧洲、南亚等地区。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符号,但中国本土并没有狮子,那么,狮子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呢? 根据《穆天子传》(晋·郭璞注)所记载周穆王驾八骏巡游西域一事,其中提到有“狡狴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狡狴,师子(狮子)”,如此可推断,周穆王在位离今3000年之前便有“狮子”的记载,称为“狡狴”。汉代初年成书的《尔雅·释兽》中记有“狻麐(狴),如狢,食虎豹”,更明确地说明当时人们知道除了虎豹猫狗以外还有一神乎玄乎的异兽,并名之为“狮”。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各地的友好关系,原为“殊方异物”的狮子才正式被中国人所认识。据司马彪《续汉书》记载:“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符拔。”到了唐代,丝绸之路迎来黄金时代,西域狮子更多地进入中国。根据《旧唐书·西戎传》,中亚康国“贞观九年,又遣使贡狮子,太宗嘉其远至,命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这便是《狮子赋》:“瞋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遁兕于振鬣,屈巴蛇于指掌。践藉则林麓摧残,哮吼则江河振荡。”

从此就可看出唐人为狮子的威猛所震撼,有趣的是,当时还产生了一些有关狮子神奇的传说。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驛树。树近井,狮子嗜吼,若不自安。俄闻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显然,狮子在唐代的形象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真正使狮子的形象神化为一种有力量的瑞兽的,是佛教。凶猛的狮子,究竟是如何与佛教联系在一起的呢?

佛教中的狮文化

佛典中有关狮子的说法可谓俯拾皆是,《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载:“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狮子在佛教文化中地位非常高,常用来比喻最有威望的人,譬如《大智度论》曰:“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此外,还有著名的“狮子吼”,《传灯录》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史博馆】

狮文化的由来与魅力

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维摩诘经》说佛国品》也提到,佛家诵法时“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另外,狮子还是文殊菩萨的坐骑。相传狻猊是龙生九子之一,喜烟好坐(大部分关于狻猊的艺术品都与香炉有关),佛祖见它有耐心,便收在身边,后为文殊菩萨的坐骑。敦煌第159窟西壁的“文殊变”,壁画中的狮子圆目、张嘴、翘尾、一头石青色的鬃毛卷若云朵,身披华丽鞍鞯,上有莲花须弥座,文殊菩萨坐于狮子背上的宝座,神情安祥。

由此,狮子在佛教中即是护法者形象,又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凶猛强悍,威震八方,因此后来其形象逐渐被人们用来作为护卫者和辟邪物。狮子便是以这个全新的文化形象,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并逐渐在历史长河中慢慢促成了一种中国本土独有的“崇狮习俗”。

崇狮习俗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无不带有本民族、本地域独特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形成,又得益于本民族的地域、风土和固有的宗教信仰。中国的地土虽然不产狮子,但当外来的狮子文化传入以后,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理想和情操。狮子作为百兽之王,《坤舆图说》描绘:“狮为百兽王,诸兽见皆匿影,性最傲,遇者急俯伏,虽饿食不噬。”人们见识到狮子王者的威仪、加上狮子在佛教中的文化含义,无不象征着威望与力量,因此普遍认为狮子能够驱邪御凶、守护人们的安全。早在汉代或六朝,狮子便被赋予了“辟邪”的功能。相传,南梁梁武帝时期著名画家张僧繇所画的狮子图也有辟邪驱灾的功能。到了唐朝,已经有以石头雕刻狮子用以辟邪、守护的传统,尽管其起源尚无明确的史料记载,但狮子作为“守护神”“辟邪物”的文化含义在历史的更迭中是愈发受大众喜爱。大部分的传统建筑门前无论是宫殿、衙署、府第、庙宇,甚至一直到现今的一些现代建筑,我们仍能看到一对雄威震宇的石狮子伫立在门前,昂首挺胸担当着守护者的职责。

人们对狮子的喜爱还体现在另一个重要的传统活

动——舞狮。舞狮的起源迄今尚无明确定论,根据《旧唐书·音乐志》,其中有一段关于“太平乐”的记载:“太平乐,后周武帝时造,亦曰五方狮子舞,缀毛为狮,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狮子各立其方位,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这里所谓的“太平乐”与现代所理解的“舞狮”颇为相似,这是关于“狮子舞”起源较为明确的史料记载。现今,舞狮已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活动,甚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享誉海内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舞狮活动存在。

狮子的形象在历史中并不一直是威猛的状态,而是同时逐步具有了吉祥可爱的形象。到了宋代,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狮子的项颈上有一条项饰,一对狮子舞绣球。这一根本性的变革,从西方狮子演化为中国狮子,狮子从野性转为驯化,从“王者”地位,徐步迈入民间百姓之家,终于定型为挂着铃铛的雄狮和雌狮,以抢球和抱幼狮作为中国狮文化的固定格式,喻意“子嗣昌盛”。

狮子的形象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可谓深入人心,少林七十二绝技中也有以狮子为原型的功夫,即“狮吼功”。有趣的是,“狮吼功”还衍生出一个带褒义的俗语,即称悍妇恶骂为“河东狮吼”。相传宋代苏轼的朋友陈慥,号龙邱居士,他喜招宾客,好谈禅理,但他的妻子柳氏悍妒,陈慥非常怕她。苏轼曾赋诗戏之云:“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元明清时期,狮文化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基本定局,并进一步渗透到民间,应用的范围扩大,造型变化多样。如在宁波,“狮子”谐音“赐子”,故婚庆嫁妆一定要有。大狮与小狮,又喻为“太师、少师”,“连登太师”等。建筑物和民间家具中的狮子陈设也必不可少。

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中国狮子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千年以来逐步形成的文化遗产,即使在物质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现代,多姿多形的中国狮子文化依然有着巨大魅力,与中国的龙凤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郭文